

肝胆深情

友情难忘

——父亲刘文辉与中共领导人的友情

刘元恺^①

我的父亲刘文辉从 1938 年起开始与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王若飞等党的领导人交往，并在他们的帮助教育下，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做了一些事情，贡献了一份力量，同时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9 年 12 月 9 日，父亲与邓锡侯、潘文华将军率国民党四川部队起义，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父亲起义后住在成都。成都是 1949 年 12 月 27 日解放的，1950 年 1 月 1 日，建立了人民的政权——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当时领导和主持成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贺龙、周士第（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等领导同志。

刚刚解放的成都，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工作繁多，关系着成都社会稳定与人民生活安定的数十万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整编改造工作首当其冲。为此，贺龙与周士第（时任成都市市长）经常到我家与父亲商量起义部队的整编问题。在父亲的配合下，二十四军不仅顺利进行了整编，而且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成都大邑县的剿匪斗争。一次，贺龙来我家看望父亲，正遇父亲的哮喘病复发，父亲告诉贺龙，抽烟对治病不利，他准备戒烟。贺龙劝父亲不要急着戒，他说只要认真治疗，病慢慢会好的。抽了那么多年的烟，戒

^①作者系四川省政协委员，刘文辉之孙女。

起来很困难。

1950年初，父亲受周总理之邀，去北京商讨一些事情，历时一个多月才回蓉。这时为巩固民主革命的成果，川西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为了避免农民的过激行动，贺龙让警卫部队加强了对父亲的保卫。后来，川西区让父亲担任劳动实践考察团团长，到农村去考察。临行前，贺龙告诉父亲：你身体不好，只带队，不要劳动。

1951年，父亲调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邓小平有了接触。一次，邓小平兴致勃勃地邀请父亲去观看“八一”篮球队与××队的比赛。父亲说：“我一点都不懂篮球”，表示不想去，邓小平非要父亲去不可，并说：“人要多运动，身体才会好”。父亲说：“我老了，动不了啦！”但父亲还是跟邓小平去观看了篮球比赛。比赛期间，邓小平兴奋地充当解说，并仔细地向父亲讲了篮球比赛什么叫输，什么叫赢。

1959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父亲调中央林业部任部长，我每年去北京看望父亲一次。1960年的一天，邓小平、贺龙、陈毅、李先念、李维汉等领导人说我父亲的厨师川菜做得好，要到父亲家里来吃饭，其实是想来看望父亲。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商品奇缺，父亲发愁地说，你们来那么多人，我拿什么招待你们。当天，国务院派人送来一些菜，党和国家领导人坐了一桌。席间，宾主谈笑风生，陈毅还唱了川戏“拾玉镯”。邓小平说：“我们以前也会唱川戏，现在都忘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挂念着父亲。他对父亲说：“如果红卫兵来了，您就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我马上派人来。”果然，不几天，红卫兵就来抄家，父亲还没有来得及打电话，电话线就被剪断，红卫兵叫嚷着要父亲交出金银财宝，要查封父亲的东西。父亲告诉红卫兵，金银财宝都被胡宗南抢去了，但红卫兵不相信。正在僵持不下，中南海的卫兵来了，并说：“周总理通知刘部长去开会，非去不可。”父亲才得以脱身，出去一看，总

理办公室主任和林业部的一位副部长已在车上，汽车把父亲直接送到 301 医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父亲被保护起来。

同年 8 月，毛主席开始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一次、两次，父亲都是有请而未到。周总理问及原因，父亲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怎么上天安门，我的衣服都被查封了。”周总理立即派人启封。父亲有了衣服，参加了毛主席第三次至第八次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活动。

父亲参加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活动时，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看见父亲就走过来，十分难过地说：“老朋友，对不起，没有把您照顾好，我实在太忙了。现在衣服都已启封，您就在 301 医院多住一段时间，等形势平静后再回去。”过一会儿，毛主席也走过来亲切地对父亲说：“您怎么还穿这身衣服（父亲当时穿一身灰色高级呢子制服），去弄两套我们这种军服来穿。”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番话使父亲百感交集。

尽管父亲长期住在 301 医院，受到保护，但无休无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危害使父亲忧心忡忡，寝食难安。1974 年，父亲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总理得知后，下令成立刘文辉医疗小组。1975 年，医院查出父亲患了肺癌，总理在百忙中仍然十分关心父亲的病情，并很快作了批示，这就是：加强药物治疗和家属的护理工作，病情不要让本人知道，也不要外传；病情发展和治疗情况要天天报告国务院。总理还让办公室工作人员周彤把这些指示转告我们。我们兄弟姐妹根据总理的指示对父亲进行了精心地护理。总理病重后，父亲的医疗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分管。

父亲住院期间，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常去看望，邓颖超也多次派秘书前去看望，并嘱咐父亲：“安心养病，什么都不要管。”父亲在医院里十分想念周总理、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对我说：“我有许多话想对朱玉阶（朱德的号）说。”他还说：“毛主席就遭在三点水（即江青）身上。”遗憾的是，父亲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父亲和朱老总都身不由己，无法相见。

1975年3月23日,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部特赦战犯,父亲也随中共领导同志参加接见。会上,父亲看见邓颖超,十分关切地询问总理的病情,问总理好不好。邓颖超回答说:“总理好,刘老您好不好。”又说:“今后气候好了,大家都好。”父亲深思着邓颖超的这句话,一回到医院就对我说,邓颖超这句话是一语双关。

就在这一年,周总理病势加重,邓小平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整顿,成效显著。父亲十分高兴,他说:“邓小平一出来,中国就有办法了。”父亲的心情也逐渐好起来。一次,父亲去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当与中央领导人一起,从西楼进入人民大会堂时,遇见了邓小平。邓小平看见父亲坐着轮椅,开玩笑地说:“刘老,下来走啊,走路比坐着舒服。”父亲说:“我要走得就不会坐轮椅了。”

“四人帮”对邓小平的复出怀恨在心,掀起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父亲对中国的命运更加忧虑。1976年1月,周总理病逝,父亲悲痛万分,整日茶饭不思,口里不断地说:“中国失掉了周总理,恼火。”父亲拿起多年未拿的笔,用颤抖的手给邓颖超写信,对总理的逝世表示哀悼。邓颖超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您自己的病那么重还写信慰问我,字里行间看得出您与总理的友情,看得出您的悲伤,我感谢您。

总理追悼会那天,父亲坚持要去送别总理,并说:“抬也要把我抬去。”从此,父亲病情加重,心情更加抑郁。就在总理去世不久,1976年6月,父亲也走完了他82岁的人生历程,与世长辞。

以上回忆是父亲生前零零星星讲给我听的,我一直铭记在上。

(此文写于1997年7月)

父亲邓锡侯与中共领导人的友谊

邓亚民^①

我父亲邓锡侯，字晋康，1890年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回龙场。家贫，父母早亡。幼时人私塾读书，勤奋好学，孜孜不息。当时清廷在成都开办陆军小学堂，父亲前往报考，竟被录取。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被送至南京陆军中学堂，后又升送入保定军官学校。辛亥革命前夕，因受革命影响即回川参加新军。民国建立后，转到川军第四师刘存厚部任职，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成为对全川政治、经济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1949年12月，父亲与刘文辉、潘文华三人联名通电起义，弃暗投明。解放后，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历任四川省副省长，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为川康的和平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1955年国家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这一切与他受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中共领导人的帮助与教育是分不开的。

朱德亲切教诲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唐继尧、蔡锷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反对“洪宪”帝制，爆发了著名的“护国战争”。当时在刘存

^①作者系邓锡侯之子，市政府参事室原副主任。

厚部任营长的父亲也率部参加了反袁护国战争。1916年2月,邓部占领泸州兰田坝,并奉命驻守棉花坡南翼马鞍山阵地,北翼由朱德支队守卫。父亲与朱德协同作战,相互支援,打退了袁军的多次进攻。这次共同战斗使他们结下了难忘的情谊。

1935年当朱德领导的红军准备与理县、茂县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父亲奉命率部队从后山侧面攻击宝兴县的红军。朱德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给他写了一封密信:“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国难当前,应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有困难,暂时不来,希望互不干扰……”父亲读信后,深有感触,随即令追击部队与红军保持一天行程距离,只要能将蒋介石应付过去就行。

1935年12月,朱德又给刘湘和父亲等川军将领发出了公开信。朱德以埃塞俄比亚为了民族生存,举国团结,抗击意大利法西斯强敌的具体事例教育川军将领,呼吁川军与红军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朱德对川军的宣传工作,激发了川军将领和广大士兵的民族意识,鼓舞了他们的抗日热情。1937年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川军将领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纷纷请缨杀敌。父亲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出川抗战。同年11月6日,父亲率部队抵山西前线太原附近的南畔村。由于阎锡山未通知父亲阎部已撤退,致使父亲陷入敌人包围。突围脱险后,父亲即奉命驻防山西洪桐县。恰逢朱德也率八路军在这一带抗击日寇,总部就设在洪桐县东关外一个村庄,因此,父亲又得以与朱德经常会晤、交谈,从中受到不少教益。父亲还多次请朱德给二十二集团军团以上军官讲抗战形势,授游击战术,从而增强了官兵抗日杀敌的信心。之后,父亲部队奉命调往鲁南,参加保卫徐州和台儿庄战役。临行时,朱德赠送父亲战马一匹,以示永不下马,抗日到底。以后,朱德从华北前线回延安参加中央会议,路过西安时,遇到过去的教师李根源,托李给父

亲带信，鼓励他抗战到底。1949年12月9日，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父亲和刘文辉、潘文华率部在彭县通电起义。刘、邓、潘起义后，朱德总司令又立即回电嘉勉：“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欣慰。”父亲在回忆起此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这才是我公开与蒋决裂，投向人民的开始，也是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向新生的开始。”

1955年，父亲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他同几位川籍代表去看望朱德副主席。辞别前，一位工作人员对父亲说，朱副主席请你留下来，等一下。朱副主席送走其他客人后，坐下来同父亲叙谈。他问起了父亲的工作和家里的情况，还提到现在还喜欢打猎等运动和爱好，对父亲表示了亲切的关怀。后来，父亲每年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朱德副主席都要亲自到四川代表团的住地——前门饭店去看望父亲和其他代表，和他们亲切交谈。

周恩来雪中送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湘和父亲等川军将领皆请缨杀敌。1937年8月，国民政府拟调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14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任命刘湘为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父亲为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

嗣后，国民政府为适应前线战局需要，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父亲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邓率所部于1939年9月从川陕公路出发，经过一个月急行军抵宝鸡，转乘火车到达西安，即奉蒋介石急电，以娘子关吃紧，赶赴山西前线。时届深秋，士兵衣衫单薄，部队装备低劣，将士全凭血肉之躯与拥有飞机大炮的强敌战斗，伤亡惨重。父亲请阎锡山补发装备，阎托辞不给，甚至连一张山西军用地图也不给，父亲遭此冷遇，万分颓丧。正当其时，周恩来亲自来访，为父亲介绍山西

抗战情况，分析当前战局，并将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军用地图（山西部分）送给了他。后来，父亲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十分感动地说：“正当我感到万分苦闷的时候，就想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请教周恩来先生，不料周先生却亲自来访，使我万分激动。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是多么需要朋友的指点和帮助啊！周先生为我详细介绍山西抗战情况，分析战局，恳谈两小时，还送我几张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山西部分），真是雪中送炭，我终身难忘。”

贺龙讲团结交朋友

1949年12月9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父亲率部起义。贺龙司令员率领的解放大军入成都不久，便积极做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他登门拜访了以刘文辉、邓锡侯等为首的川军起义将领，征求他们对各项工作的意见，并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具体问题关怀备至。周末，贺老总还邀请父亲全家去浮图关西南军区参加晚会或鸡尾酒会。

1950年1月中旬，父亲在成都庆云西街家中请贺老总吃晚饭。贺老总身着黄色军装，精神爽朗，谈笑风生，宾主融洽。贺老总介绍了一些解放区的情况，又追忆了20多年前就走过大半个四川的往事。在座各位皆感往事已矣，现在当为国家建设努力。后来，贺老总谈到：“我们共产党人，是要讲团结、交朋友的。我们不是光晓得打仗，也是讲道理的。有些事，要讲大道理，也要讲小道理，大道理装小道理，有些不好解决的事都解决得了。”父亲深感这一番话深切感人。晚饭行将结束之际，贺老总又谈到我们都要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父亲点头同意。当时，在座的都希望能学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请贺老总派员来讲授。几天后，张秀熟先生就被派来邓家讲课了，每周一至二次。听课的有10余人，坐满了我家的客厅，很少有人缺席。讲授直到4月初父亲奉召到重庆就职时才停止。

有一天，贺老总和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专门请父亲等起义将领到红照壁剧中看戏，由西南军区文工团演出话剧。剧情大意是一个纱厂资本家如何残酷剥削工人。贺老总和父亲坐在一起，边看边给父亲解释剧情。他说：“这个戏已演了多年，很教育人。”父亲说：“演得好。看了这个戏，更使我感到过去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贺老总勉励他说：“你们也是有功之臣。你们的起义，为四川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共产党感谢你们，人民也不会忘记你们。”剧中休息时，贺老总还与父亲谈了许多家常话。父亲被调往重庆任职时，贺龙特在上清寺‘范庄’设宴招待我们一家，席间如老朋友一样亲切。

与陈毅的一次会聚

20 世纪 20 年代末，陈毅曾在川军第二十八军陈书农师中作兵运工作，父亲时任二十八军军长，两人从此结下了友谊。

1956 年，陈毅副总理到东南亚访问，回国返京途经成都时，父亲请陈毅在成都市新南门 17 街的家里小聚。陈毅副总理与父亲一起叙谈了当年在四川的友情，并谈及现在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建设，很有感慨地谈到这次出访东南亚。陈毅副总理谈到：“现在我们办外交比旧中国时好多了。国家统一了，国力增强了，我们在外面腰杆都硬得起来了，所以要努力把国家建设起来。我们办外交，不能有大国主义，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使很多问题经过谈判得到解决。”父亲举杯向陈老总祝贺外交上的成功。

（此文写于 1996 年 7 月）

七年肝胆情

陈祖湘^①

1982年初，全国拨乱反正工作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开始恢复党与非中共人士合作共事的优良传统，作为民建成都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我，非常荣幸地被选为成都市副市长。我解放前系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从事金融工作，解放后继续任公私合营建设银行经理。1952年全国银行首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我被安排任公私合营银行成都分行第一副经理（人民银行省行副行长待遇）至1958年。1980年被任命为省商业厅副厅长。鉴于这些经历，由我分管财贸工作。下面是1982年初—1988年底我在市政府工作的回忆。

书记谈话 委以重任

1982年初，成都市第九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以前，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吴希海（我当时任市政协副主席）找我谈话，说市委决定我为党外人士副市长的候选人，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要实行改革开放。考虑到你是大学经济系毕业，又多年从事财经工作，对外关系又较多，所以选拔你担任分管财经方面的副市长较为恰当。”还说：“现在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党中央很

^①作者原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建四川省委员会主委。

重视统战工作，安排党外人士到政府担任实职，这不是形式，而是要使用，安排就是为了使用。对你的安排是知人善任，就是要用你之长，为成都市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献计出力。所以，现在安排你的目的是为使用，绝不是做样子。”吴书记的一席话使我百感交集。拨乱反正不久，中共就如此重视对党外人士的安排，真出乎我意料，我又激动又高兴。但一想到十年浩劫“左”的一套至今尚未彻底清除，想到我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十年浩劫中的遭遇，对出任成都市副市长一职就心有余悸，十分不安，我担心会成为聋子的耳朵。

走马上任 受到尊重

成都市第九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中我被选为副市长，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马上任。在市政府，我协助市委常委兼财贸部部长、副市长王忠同志分管财贸工作。在第一任副市长期间，由于我初到市府工作，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因此开始时我先分管商业工作，第二任副市长期间，因我情况已较熟悉，逐步协助他管全部财贸工作。我认为王忠同志是市委常委兼副市长，为体现党的领导，自然以他管为主，我只能是协助分管，因此在开始工作时，我总是事事向他请教，他决定，我执行。但他认为这样不利于发挥我的工作主动性，调动我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搞好合作共事关系。他对我说：“在工作中接受党的领导主要是接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我们之间，主要是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因此，他提出，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制定有关财经方面的方针政策，我们共同学习讨论，并结合成都市的具体情况，提出具体的贯彻意见和实施步骤，报市委、市政府审核批准；在贯彻执行中，事关全市的重大财经会议，我们共同出席，并认真贯彻，有了问题共同研究，执行中注意总结经验；有了比较成熟的政策措施则分头贯彻执行，实施结果互通情况。

王忠对我十分尊重，凡是分管财经的秘书长、市府财经处和市财办向他汇报工作，他总是要通知我一道听汇报，一道研究讨论，共同决定问题。对由我分管的部分工作，当市府分管秘书长、处长和财办主任向他汇报时，他总是要求他们先向我汇报，我再找王忠同志研究或通气。王忠这样做的目的是树立我的威信，使我得到我所分管部门的尊重，以避免一切由他说了才算的问题。在召开全市财经方面的工作会议时，他总是要我参加或出面主持。到北京召开宣传全兴酒或文君酒的新闻发布会、争取项目、率团到沿海城市洽谈业务，他也支持我带团前往。例如，1984年，全国举行的第二次名酒评比时，我市全兴酒厂的产量还不到100吨（只有98吨多），有不能参加评比的危险。当时的二商局副局长王尊友专抓此项工作，到北京送全兴酒酒样时，中商部认为酒的质量不错，但产量是一个大问题，如这次没有评上又要等几年，全兴酒的发展就大受影响。王忠和财办何主任努力争取。因我可以通过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渠道反映情况，便由我到北京找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又找了商业部副部长黄凉尘、常务副部长姜习和原国家经委主任、中商部部长王磊等同志，请求同意全兴酒参加评比。部领导了解到全兴酒质量的确好，产量98吨多就98吨多，不虚报，态度是诚恳的，应予以支持，允许参加评比，促进名酒的发展。在评比中，评委一致赞扬全兴酒好，并认为其香型为清香型，很有特色，获得金奖。从此由中商部与四川省商业厅和成都市二商局共同抓全兴酒的发展，全兴酒才有今日的规模和辉煌成就。如果当时不努力争取参加全国名酒评比，得不了金牌，再好的全兴酒也只能是小规模生产，形成不了今日的大气候。以后，在抓成都市的商业时，我把力量放在酒的方面较多。在我的任期内，成都全兴酒和文君酒等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都是由我率领二商局王尊友、王筑生，财办黄留福和酒厂的厂长等同志一道去，由我主持。

由于四川的名酒多，各类粮食白酒的数量大，食品资源丰富，四川的市场大，成都的商业、饮食、服务业发达，到 1985 年全市的各类宾馆、招待所、旅馆和旅社的高、中、低档床位达到 20 万个，交通也比较方便，具备了举办全国性的大型会议的条件。我市财贸系统主要是二商局（包括饮食服务局）、一商局、供销社等所属公司。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扩大交流，搞活流通，形成大商贸、大流通、大市场，我们都积极支持他们争取全国性的会议到成都开，要求大家提高接待质量，提供优质服务，软硬件上台阶，才能战胜竞争对手，取得更好的实效。当时争取来成都的大型全国性会议，如全国土特产品交易会、全国家电展销会、全国中成药展销会、全国化工展销会等都是上万人的大型交易会。全国性的糖酒交易会是 1984 年开始准备，1985 年就绪，1986 年正式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春季糖酒交易会，到会人数多，成交金额也很大，反映强烈，效果甚好。我们在此基础上，加强了组织领导，原来糖酒会是由市政府主办，二商局糖酒公司承办，后来考虑二商局糖酒公司有自己的业务，同时糖酒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来的人越来越多，交易金额也越来越大，规格也越来越高，由糖酒公司来搞，明显承担不了，因此，另外在市政府成立一个会务办公室，正局级单位，主要承办全国糖酒会，在糖酒会以外，也办理其他全国性会议。

成都举办糖酒会有专门机构抓，有分管财贸的副市长直接领导，二商局和市级其他单位积极配合，还有四川省领导的关怀，省级有关部门的支持，所以争办全国糖酒会的地方虽多，但由于成都市的条件较好，办会工作越来越有经验，到现在已连续办了十届，交易额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对宣传成都、发展成都、带动其他行业，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兴办农贸市场也是成都市抓得较早的事，在王忠的主持下，我积极参与了成都市荷花池市场的建设，经过王忠和市财办何用先主任和我的共同努力，到 1987 年—1988 年荷花池市场已进入全国十大市场的前列，由农贸市场、中

药材市场发展成纺织品市场、百货市场等综合性市场，对成都大商贸、大流通、大市场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王忠对于民建、工商联和其他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关于成都市财贸方面改革开放的意见非常重视，并要我与他们多联系。只要有重要建议提出，他与我和何主任就与有关局的领导及时进行研究，根据需求和可能，结合我市实际，予以采纳。特别是对商业和饮食服务业方面的改进意见，还通过我邀请民建、工商联成员中有经营管理经验和业务技术专长的人士参加研究和贯彻实施。这样既调动了民建、工商联成员投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又走了群众路线，做到了集思广益。如采纳了成都市民建、工商联关于改革饮食服务业经营管理的十条建议，通过发展和调整商业网点，逐步恢复成都市近 300 种名小吃；鼓励名师带高徒，以继承和发扬川菜的特色。并要求市饮食服务公司等有条件的单位和学校，开办厨师培训班，大力培训青年厨师，在此基础上进行厨师考试、川菜评比和厨师职称评定。几年来，全市共评出三级以上厨师 3000 多人，为国内外各大城市和我国驻外使馆输送川菜厨师创造了条件，也为出国办川菜馆创造了条件。通过改革开放，使川菜获得了新生。由于川菜在色、香、味、型、器等方面独具特色，很快走向了全国，走出了国门。成都菜更是浓淡适中、色香兼备，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成为川菜的代表，很快便誉满全国，飘香海外。

1986 年世界美食节在北京建国门中信公司大厦举行，由香港餐饮业巨子伍淑清女士主办。这次美食节川菜的展出是重点，王忠很重视，请我率领饮食服务局局长易永贵和财办的同志选派名厨参加，在为期一月的展出中，制作精美的各色川菜和糕点令中外品尝者大饱眼福和口福，他们赞誉“这是一次最美好的享受，令人难以忘怀”。

王忠同志在合作共事上对我的支持、帮助和尊重，大大提高了我在干部中的威信，也大大调动了我工作的积极性，我不再顾虑重

重，消除了余悸。我对王忠也很尊重信任，我们推心置腹，坦诚相见，互相支持，彼此信任，合作共事搞得很好，党内外形成合力，步调一致，把成都市的财贸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1987年，王忠调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任行长，何用先同志接替他的工作，何副市长对财贸工作很熟悉，在成都市的改革开放中，出了不少好点子，对我的工作支持也很大。我常常想，在改革开放伊始，“左”的影响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的情况下，我这个党外副市长如果没有市委吴书记、市府胡市长的关怀，没有王忠、何用先、方家祥副市长的亲密合作和积极支持，没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做起工作就会障碍重重，要有什么作为就很困难了。

领导信任 有职有权

在我任副市长期间，吴书记经常找我谈心，听取各党派对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和社会上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吴书记对我说：你参加政府工作不同于在市政协，政协副主席一个党派一个，而副市长只有一个。你参加政府工作，负有双重任务，一是政府的财经干部，要做好本职工作；二是党派的代表，但你又不单是民建会和工商联的代表，而是各党派的代表，是党外人士的代表。他要我在工作中多与各党派的人士接触，还要广泛联系群众，对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的意见、建议和社会上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及时反映，以便不断改进工作。同时，对市委、市府的政策措施和反映意见的处理情况，也要向各党派和群众宣传、解释，以沟通情况和协调关系，促进了解，增强团结，也就是要做统战工作。

吴书记的讲话，使我对市政府工作中的任务和责任，有了新的认识，大大提高了我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在吴书记支持下处理的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1983年，市二商局所属蓉城饭店开始试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由饭店经理刘××承包经营，第一年来获利几十万元，二商局决